

“玛纳斯奇”在演唱《玛纳斯》



63岁的格萨尔说唱艺人

西让卓玛,12岁就开始用她独特的方式唱颂《格萨尔》史诗

演唱英雄史诗《江格尔》的民



间

艺人蒙古语叫做“江格尔奇”的民



苗族歌师轮换上场,手持古宝剑唱诵《亚鲁王》史诗

## 凤尾竹下

□叶梅



主编第一視野

到德宏芒市是夏末时候,进城已是夜晚,由车拉入一簇簇凤尾竹摇曳的园子,月儿果真就挂在竹梢。只听周围人声喧哗,却只见人影绰绰,都被茂密的竹林掩住了;空气中散发着一股甜甜的清新,还有扑鼻的花香。

德宏是傣语的音译,“德”为下面,“宏”为怒江,指的是“怒江下游的地方”,在云南省西部,芒市是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府所在地,下属陇川、盈江、梁河、瑞丽,三面为缅甸所围。《民族文学》杂志与云南省作协在德宏州委的支持下,2011年在这个美丽的的地方举办了全国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笔会。这是一次难得的聚会,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赶来了几十位不同民族的文学朋友,有来自东北的鄂温克族、赫哲族、俄罗斯族,新疆的塔吉克、乌孜别克,西藏的门巴人,还有南方的高山族、京族等,他们兴奋地相聚在竹林下,南腔北调说说衷肠。还有一些阿昌族、基诺族、普米族、怒族、德昂族、布朗族的作家,他们属于云南本省26个世居民族中的较少民族,虽然都在云南,但其中好些人却从未到过德宏,也都是跋山涉水而来,但他们在远道而来的外省人面前,一个个都俨然以主人的热情与熟悉,笑对各民族兄弟。

30年前也也正是在德宏,甚至就是在我们下榻的芒市酒店,当年《民族文学》的主编玛拉沁夫一行曾举办过隆重的少数民族作家笔会,给德宏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回让人们高兴的是,丹增和玛拉沁夫又一次来到了德宏,玛老兴致勃勃忆当年,谈文学,与年轻人一道举杯共饮。参与过当年笔会的云南省作协主席黄尧,那时还是一位初出茅庐的小青年,人称文坛四小美男子之一,那几位为何人未曾考证,如今黄尧风度不减当年,但两鬓却已斑白,惟有文心依旧。此前的一次文学聚会上,我曾谈到办刊中所感受的少数民族文学一些状况,会后黄尧递过一张纸来,说你介绍的情况很好,我再给你补充一些云南的作者和作品。当下便读,只见这张纸写得满满的,排列了云南人口较少民族一些还比较陌生的作者姓名,还写了他的文学见解,如对少数民族文学不仅要扶持,还要不断提升;对作者不光要给予还要有标杆,才能促使真正的好作家好作品产生。在德宏,黄尧对参加笔会的年轻作家们言辞恳切,动情处声色激昂,显出真性情。

玛拉沁夫指着身穿景颇简裙的德宏女作家玛波说,时光真快啊,就记得她还是个小姑娘呢。德宏人爱文学,自上个世纪80年代玛拉沁夫等人在那里开创笔会以来,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玛波便是其中之一,她用母语创作的长篇小说《罗孔礼定》描写了一位女首领带领族人推翻奴隶制,走上革命之路的故事,反映了景颇人的真实变迁,曾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为这个雄狮般的山地民族创造了又一宝贵篇章。近年来,德宏阿昌族作家孙宝廷,德昂族女诗人艾果木诺也都有不俗之作,并获得“骏马奖”,在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界产生了影响。

云南德宏这片瑰丽的土地,山高林密,河流湍急,云霞升腾,更有那晶莹的美玉,争奇斗艳的动植物,因此造就的风格各异的多民族文化绚烂夺目。笔会组织前往陇川,在古老的山寨与景颇人一起感受气势欢腾的“目脑纵歌”,这是景颇族最为隆重的活动,意为“大伙来跳舞”,过去但凡族人出征凯旋、婚丧嫁娶、喜迎嘉宾都要举行。男女老少盛装步入广场,中央高高的目脑柱上绘着彩图,象征吉祥幸福、团结勇敢,还挂着皮鼓和锣。两位神色庄重的老人身穿龙袍,头戴插有孔雀、野鸡翎毛和野猪牙齿的目脑帽,手持铮亮的长刀,踏着舞步在前方带领,所有的人相跟着翩翩起舞,我们也随其后。他们不时变换队型和动作,展示着景颇山地民族千百年来生产生活的场景。目脑纵歌常常要跳几日几夜,会有成百上千的人前来参加,人们边跳边发出阵阵呐喊,我们也由此感受到了勇敢和力量。

德宏多美女,或许是因为美玉滋养的缘故。傣族阿妹的歌声撩动心扉:月光下面的凤尾竹哟,轻柔美丽像绿色的雾,竹楼里的小姑娘,光彩夺目像夜明珠……在美丽的傣族阿妹的陪同下,我们去到瑞丽、陇川等与缅甸交界之地,见到了不少美玉。瑞丽与缅甸的木姐、南坎山连山水连水,具有一个坝子,两个国家,三座城市”的独特风光,那里的玉石尤为出名,一件件玲珑剔透的翡翠价值连城。不识玉的我们拿起又放下,终究辨不出成色,一路上大家禁不住寻根问底,想弄个明白,殊不知玉石文化也如深潭,越往下潜则越觉得深不可测。有一种“赌石”引起大家的兴趣,就是从一块块黑黄模样的矿石里挑选出含玉的来,真好比一赌,有的挑后当场切割,多半会什么都没有,普通顽石一块,但意外的惊喜也会偶尔出现,一刀切下去,绿莹莹的玉突然就露了出来,引得围观者一片惊呼。还有的买下赌石却并不打开,只是想带回家去,放在案头作为一个念想,那石头里是否包藏着玉,会给人永远的猜想和希望。在德宏待的时光长了,会觉得人如玉,玉如人,都是通灵性的,要识玉需要用心才行。

我们伫足于畹町口岸,正是风和日丽,大家都在与缅甸九谷(捧寨)口岸相接的界碑处留影,1937年此处成立了海关,二战期间滇缅公路和史迪威公路修通,正是从畹町口岸将国际上的大量援华物资运入中国,中国的10万远征军也正是从这里出境征战缅甸。在口岸附近的大道旁有一座白色的小楼,德宏人将它建作“国门书社”,里面陈列了很多书籍,附近的傣族景颇族与缅甸人均可以方便地来此阅读。那天,走进书社的近百名少数民族作家纷纷表示要赠书于此,主人很欢喜,说要设一个专柜来展示全国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回京之后,闻说不少作家已将书寄往畹町,但愿相互美好的承诺能得以长久,让这座敞开大门的“国门书社”成为连接中缅两国人民友谊和文化交流的桥梁。

走遍德宏,天气似乎总是那样明媚温和,一如德宏人的微笑温暖可人。告别芒市的前夜,我独自走上街头,看不够月光下的凤尾竹,心里不禁在想,如此美丽的地方,曾经诞生了《孔雀公主》《勐垅沙》《边寨烽火》《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等一批批优秀文学影视作品,明天还将有何等新的美妙示于世界呢?

## 史诗与口头传统的当代困境与机遇

——访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朝戈金

□本报记者 明江



朝戈金

近日,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重点项目——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的出版成果发布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作为迄今所知第一部苗族长篇英雄史诗,《亚鲁王》是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发现,其文化和学术价值绝不能低估。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与三大史诗——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蒙古族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形成了有趣对照,以特异的存在方式,神秘的传承和流布规律,昭示着民间文化的博大精深。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以后,全国“非遗”保护工作迎来了难得的新机遇。不久前,全国规模最大的非遗大型展览展示活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成果大展在北京举办,其中展出了不少与少数民族口头传统有关的展品,比如与《格萨尔》关系紧密的唐卡,与维吾尔古典诗词、民谣有关的十二木卡姆乐器,反映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的民族织锦技艺。各民族丰富的传统文化深深地植根于生产生活中。

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民俗学会会长朝戈金,长期从事史诗和口头传统研究,在《亚鲁王》的出版成果发布会上,他详细介绍了这一史诗的独特性和重要性。日前,就我国少数民族史诗和口头传统研究的情况、保护和传承情况,以及人类口头遗产所面临的困境及现代化的保护传承之路等问题,朝戈金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记者: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发展,许多国家都加强了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不久前在北京举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成果大展中,180多项非遗保护项目同台展示,观众反响积极,很多观众手捧相机争相留影,场面非常热烈。我们知道,史诗与口头传统也是非常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有可能纳入生产性保护工作环节中?如果不能,如何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这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

朝戈金:很高兴你们注意到前几天的这个以“生产性保护”为主题的大展,一些代表性的艺人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展示吸引了很多观众。这些展演生动直观地显示了民间工艺的繁复和难度,传递了民间审美情趣中令人仰视的高妙境界,还有其中蕴涵的文化因子。

另外,《亚鲁王》的故事因为与创世纪、与咒语等结为一体,较为难于界定《亚鲁王》究竟属于什么文类。还有,《亚鲁王》从演述语的层面看,固然具有史诗所具有的基本形态和功能,但其内涵和功能,也具有其他民间叙事文类的特点,例如神话、传说和故事等,所以我认为它属于“超级故事”,带有混溶性,难以遽断其学术归属。《亚鲁王》的意义也主要在这里,它提示我们,搜集工作是没有止境的,不能因为进行过“普查”就觉得摸清了家底儿。民间的文化蕴藏总是会令人吃惊。

再者,不能简单化地对待民间文化事象,它们是民众创造和传承的,它们来自生活,顺应需要,不会严丝合缝地符合教科书的条条框框,这也就为界定、阐释和研究它,带来挑战。学界应当充分尊重民众文化的特性和规则,而不是方枘圆凿,削足适履,让教科书规范民俗事象;还有,从《亚鲁王》中充盈着的英雄主义气概和苗族先祖的迁徙征战历程中,我们能够发现在今天仍然具有很高社会伦理和审美价值的因子,它们对今天的社会文化建设,已然具有难以估量的作用和意义。所以,《亚鲁王》的出版首先要归功于那些在民间长期传唱的众多史诗演述人“东郎”,特别是麻山地区的苗族民众。没有他们对本民族传统的坚守,我们今天就没有机会目睹这项遗产的大众消费状况和前景。如果人们愿意掏腰包去剧场观看史诗演述,那么,我认为史诗也可以变成生产性保护的艺术品。遗憾的是,史诗这种文类,主要产生于人类文明的相对早期阶段,它所处理的题材、主题和人物,它所传递的英雄主义精神和理想情操,它所运用的语言和采用的艺术呈现方式,都是面对特定历史阶段的人们的。虽然说,那些伟大的史诗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但就总体而言,无论在哪个国度,今天已经很难通过市场手段来挽救濒危的史诗演述传统了。

但这并不等于说,史诗已经没有多少价值,是可以轻易丢弃掉的累赘。比如欧洲史诗,就已经家喻户晓,成为众多艺术体裁和形式的素材和主题。譬如希腊史诗出现不久,史诗故事的片段就以极为精美的形式大量出现在希腊彩绘制作上。再到后来,在整个欧洲的艺术史上,希腊神话和史诗无数次地成为造型艺术作品的核心内容。它们不仅是审美体验的永恒对象,而且是创新艺术的灵感源泉。我去年与德国学者赖歇尔对谈古典学在我们各自国度的现状时,他特别提到,在年初出笼的德国最受读者欢迎的书中,就有德译《荷马史诗》。

至于说,对这类大型民间诗体叙事文类,究竟应当如何“保护”,我觉得要具体区分不同情况,分别设计不同保护策略。比如说,在青海的果洛州,特别是在像德尔文部落这样的地方,史诗保护需要采取整体保护的策略,因为这里是著名的“格萨尔”史诗村,史诗传承和演述活动相当活跃。那么,尽量减少生硬的介入和指导,而是柔性顺势鼓励《格萨尔》演述活动的振兴和发展,是我们应当首先采取的策略。当然,切近地、科学地观察和记录史诗演述活动,也是当前学界应当抓紧做的重要工作。

记者:我们可以看出,对苗族史诗《亚鲁王》的发掘和出版,学界认为是一项非常重大的成果,它的价值可与三大史诗比肩,能否介绍一下它的重要意义所在?

朝戈金:《亚鲁王》的面世,具有多重意义。首先,它说明我们的非遗工作有多么大的难度啊。数度推行的对民间文化“清理家底儿”的运动中,它都没有进入有关人员的视

雄史诗,在南方高原农业和山地农业地区主要分布着创世史诗和迁徙史诗的话,像《亚鲁王》这样将三个主要类型的内容熔铸于一个叙事传统之中的例子,还不多见。也是由于这种混溶的内容,令这个叙事传统同时具有神话、传说、故事等特征。所以,如果我们称《亚鲁王》是“超级故事”,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是该诗的第四个特点。

与其他流传更广的史诗传统相比较,《亚鲁王》的传播地域相对集中和狭小,边界比较清晰。我们可以看到,《亚鲁王》是属于那种带有明显“地方性”的传统,那么,相较于我们今天所知大多数史诗都是“民族的”史诗而言,《亚鲁王》则更具有“稀有样本”的意义。得益于地理环境的特殊性,麻山的苗族民众较好地保存了该史诗地域的和亚族群的属性,这是该诗的第五个特点。

就语言而言,《亚鲁王》的叙事语言古奥难解,一些语词的含义,就连演述者自己也不清楚。这为我们更好地解读和理解它,设置了障碍,不过也为研究其起源和历史发展,研究古老的语言现象,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语言学资料。这是它的第六个特点。

通过这几个特点,我想大家就可看出它的重要意义所在。

记者: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在史诗与口头传统研究方面很有成果,这几年召开了多次国际性的会议,也在国际学界多次介绍中国史诗的资料成果和理论思考成果。提到史诗,大部分人印象中就是三大史诗,能否介绍一下中国史诗研究整体情况?

朝戈金:中国的史诗学建设这些年来逐步引起国际学界的注意,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国的史诗蕴藏极为丰富,世所罕见。东北的满—通古斯语族所代表的渔猎文化圈中,有数量可观的英雄史诗。从贝加尔湖到天山两麓,是北方游牧带,这里生活着的蒙古语族和突厥语族人们,世世代代创作了数量庞大的英雄史诗。青藏高原的史诗,主要流布在藏区的牧区,这里的英雄史诗传统,在篇幅上、传承方式的复杂性上、与民众精神生活的联系上,都令人称奇。从川、滇高原延伸到云贵高原,在广袤的高原农业地区,我们见到诸多西南少数民族所创作和传承的大量创世史诗和迁徙史诗。这样一来,在中国境内,史诗传统涵盖了阿尔泰语系、汉藏语系、南岛语系等分属几个语系的上百种语言的史诗叙事传统。类型多样、语言多样、属性多样,是中国史诗的整体面貌。这令西方学者相当羡慕。我本人就不止一次听到出自西方著名学者之口的感慨之言。

其次,在这么丰厚的材料基础上,我们试图图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国际史诗理论,进而建构史诗学的中国学派。这种努力,已经得到国际学界的一些肯定。例如,我们通过大量活生生的材料,对如何理解史诗的亚类、如何界定史诗、如何阐释史诗社会功能、如何理解史诗文本的多样性属性方面,都有不同于西方史诗学界一般见地的观点和某些新的维度。在史诗田野作业方面,在史诗文本制作方面,有些新观点已经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可。此外,中国史诗学学者队伍在如何介入史诗的抢救、保护、立档、传承、研究、振兴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非遗工作流程中,发挥了直接的、正面的、积极的作用。也就是说,中国的史诗学者,是努力将专业知识和技术服务于老百姓口头传统的保护工作的。

记者:为什么口头传统研究近年来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中西方在口头传统研究方面,有什么不同特点?

朝戈金:简单说,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是许多要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中,信息传递技术的发展进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天国际社会和学界越来越意识到,人类知识的传承,主要通过口头和书面两种方式进行。在过去很多世纪里,知识界偏重文字作用而轻视口传,现在发现这太片面,需要大力纠正,于是特别强调要保护抢救、保护和研究人类的“口头传统”。

至于中外在口头传统研究方面的不同,是个很大的话题。如果从研究对象和范围上说,中国的口头传统研究,目标直指民间口头艺术诸门类,如故事讲述、史诗演述等。美国的当代国情和社会发展,已经让他们的研究,从传统口头艺术诸门类转向其他领域,例如:拒绝诗歌刊印而坚守口头吟诵的当代“色拉姆”(slam poetry)诗歌运动,黑人聚居区的“民间布道”现象,“布鲁斯”现场创编音乐流派,都是他们的研究热点。也就是说,口头传统的研究,大多转向了都市的口头创编活动上来。其次,中国的研究,在材料梳理和刊印方面,成果突出,而在理论建设方面,稍嫌薄弱。反观美国,理论流派迭出,近年来,以“讲述民族志”为标志的三大理论——“口头程式理论”、“民族诗学”和“演述理论”相继面世,影响相当深远。中国的口头传统研究,也从美国同行的理论中获益良多。

记者:在当下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中,史诗研究的意义是什么?

朝戈金:大略来说,今天的史诗研究有这么几重意义:一则,史诗研究是人文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部门,在西方的学术传统中,对史诗的讨论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开始了。在东方,印度古典诗学成果中,很早就有了“大诗”——也就是史诗的讨论,因为他们很早就产生了卷帙浩繁的伟大史诗,像《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等。中国的史诗学研究,历史虽然短,但发展势头较好,呈现出勃勃生机。史诗是人类精神和艺术创造中最为重要的形式之一,无怪乎在许多国家里,史诗研究都在人文学术研究格局中占据重要位置。再则,史诗研究对理解特定文化的作用巨大。在许多族群中,史诗是知识的集大成者,是特定民族精神文化的百科全书,它的文化史意义极为突出。三则,史诗的社会意义巨大。在许多国度中,史诗是民族认同的重要资源,是高扬民族主义、抵御外侮的利器。今天的芬兰人普遍认为,他们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人物中就有史诗《卡勒瓦拉》的创编者伦洛特,是他和西贝柳斯“歌唱者”让芬兰国旗出现在世界地图上。当然,因为史诗的社会功能极为多样,研究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记者:互联网时代,史诗和口头传统的保护面临什么样的机会和挑战?史诗和口头传统未来的研究和发展方向会是什么样的?

朝戈金:当今世界,信息交流技术获得了飞速发展,形成了新的模式,这确实在一定意义上深刻影响到了传统文化的存续和发展。不过,我倒是觉得互联网和电子技术为口头传统的传播和存储也提供了新的契机。不能一味认定新技术就是旧传统的掘墓人。例如,只有在新的音视频技术条件下,我们才能够不必亲临现场,而较为全面地反复地观摩一则现场的演述活动。在传统意义上的“现场”,则反而没有这样的便利。还有,也是通过音视频技术,我们才能较为整体性地、多视角地把握景颇族“目脑纵歌”这样大型的史诗表演,才能较为清晰地观察到大型集体舞蹈的移动轨迹是如何反射着景颇民众的宇宙观和其他重要观念的。另外,电子技术为口头传统的记录、存储、管理和传播提供了难以想象的便利,为研究提供了绝佳的资料处理手段。

我甚至梦想,或许有那么一天,我们的青年学者们,在历史文化课的课堂上,或是旅途中,利用便捷的移动终端,在线观看“荷马史诗”的“语义网”式呈现,或是“亚鲁王”的片段,以对人类文明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条件下,如何建构内部认同、如何教育后代、如何传递伦理规范、如何传授地方性知识、如何锤炼语言艺术表达技巧等,有直观、切近的了解。

人类社会从无文字社会整体上进入文字社会,信息交流技术的规则就有了很大变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口头传统会死亡。语言能力作为人类最为奇妙的能力,经过长久的进化,今天仍然是多数人所最为依赖的手段。在学术界,对于口头传统的研究,虽开始不久,但已显示出宽广的前景,有学者在热烈探讨互联网与口语交流在规则和深层理念上的契合问题,在探讨如何从口头传统的古老常新的技术中,推测人类未来信息交流的新方向和新规则。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